



文艺研究新视野

18SHIJI YINGGUO XIAOSHUO DE XUSHI YISHU

18
世
纪

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

赖骞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赖骞宇◎著

18SHIJI YINGGUO XIAOSHUO DE XUSHI YISHU

18世纪

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赖骞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文艺研究新视野丛书)

ISBN 978-7-5004-7614-6

I. 1… II. 赖… III. 小说-叙述-文学研究-英国-18 世纪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767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媧“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媧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媧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媧、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媧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媧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

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衮衮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

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前 言

18世纪文学是近代西方文学的开端，然而18世纪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一样曾经被认为成就不高，不受重视。18世纪法国文学创作相当繁荣，并以其强烈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影响广泛深远，而法国启蒙文学家多数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文学往往被当做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因此后世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着重于其思想方面。又由于18世纪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席勒式”^①倾向，以至于人们以偏概全，对这一时期欧洲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不够重视，对其文学成就认识不足。人们对18世纪文学的重新评价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瓦特之后），90年代之后则由于文化热掀起了一个新的热潮。中国对西方18世纪文学的研究则更晚。国内出版的欧美文学研究的著作、论文中对18世纪文学和英国18世纪文学的研究所占比例极小。

小说这一文体虽然于18世纪在英国文坛轰轰烈烈地出现，但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还不成熟，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及早期散文虚构故事的痕迹，与19世纪成熟的小说艺术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在讲究技巧和效率的20世纪，则难免显得幼稚和冗长。而在小说出现伊始，它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对于这一文体的研究也未能展开；19世纪是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小说创作极为繁荣，小说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人们无暇顾

^① 席勒式指的是席勒作品中一种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席勒认为艺术是使人性理想化的重要手段，他在创作中往往把主人公当做自己道德理想的宣传者或完美的人性化身。拉萨尔在他的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把剧本当做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为了达到宣传目的，不惜违背艺术规律。马克思批评他这种席勒式倾向，规劝他要莎士比亚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及18世纪；20世纪是小说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艺术的发展需要有所突破，对于19世纪小说的背离使人们想起回到18世纪寻找可资借鉴的东西，于是18世纪小说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总的来说，18世纪小说作为这一文体发展的初始阶段近期才得到充分的重视，其艺术形式及其特征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对于小说史和小说艺术以及具体作家作品（包括早期小说家）的研究理所当然地一直是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而英国18世纪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英国小说的出现正伴随着英国现代社会的形成，两者休戚相关。西方对于18世纪小说的研究从20世纪中期开始升温，因文化研究热而在20世纪90年代大受重视，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美国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所作的《18世纪小说》是有电子图书以来最大的文学作品集，包括了1700—1780年出版的英国散文作品。其中许多被文学史遗漏的女性作家被特别发掘出来。这个电子图书的制作得益于18世纪文学重新受到重视并被广泛研究。由于18世纪小说处于小说文体形成的初始阶段，因此对18世纪小说的研究自然就成为对小说文体发展的研究，而对这一时期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小说文体发展的研究与文化研究密切相连，影响较大的成果多侧重于研究小说与文化的关系。

艾伦（Walter Allen，代表作 *English Novel*）、梵根（Dorothy Van Ghent，代表作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瓦特（Ian Watt，代表作 *The Rise of the Novel*）、卡尔（Frederick R. Karl，代表作 *The Adversary Literature: 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阿姆斯琼（Nancy Armstrong，代表作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麦肯（Michael Mckeon，代表作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和亨特（J. Paul Hunter，代表作 *Before Novel, Occasional Form: Henry Fielding and the Chains of Circumstance*）等分别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①研究的不同阶段。艾伦和梵根的研究受新批评思潮的影响，偏重于探讨18和19世纪经典小说的艺术成就。

^① 在他们的论述中一般称为 *genre*，汉语通常译为“文体”，其定义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文学批评中的“文体”。

伊恩·P·瓦特在当时则独树一帜，意图整合讨论启蒙时期的哲学思潮与18世纪初期经济因素与阶级意识的互动。他的力作《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是探讨英国18世纪小说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这本出版于1957年的著作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著。该书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完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其中的哲学、宗教、经济、社会阶级、科学技术诸种因素对它的定型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研究。作品将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着重探讨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之间的关系。这部著作的文化研究倾向在西方的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瓦特认为，英国小说的起源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女性读者的增加息息相关。

卡尔1974年出版《反调文学：论18世纪英国小说》，从阶级意识相互对立的角度，将小说视为“颠覆性的文类”，指出就其定义、形式、与哲学和宗教思潮的同步发展、主要读者群而言，小说都企图颠覆传统价值（包括英国国教、地主贵族和新古典主义所代表的道统），致力于适应发展中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卡尔大致承袭了瓦特的历史和文化论，丰富了小说现实主义的内涵，相对地强化了瓦特以小说呈现一个稳定普遍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论点，同时将小说的源头上溯至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

麦肯则否定瓦特的阶级决定论，认为中产阶级根本是个不符合史实的建构。麦肯1985年发表论文《文类的转化与社会的变迁——重思小说的兴起》（*Gener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Novel*），两年后又出版《英国小说的多重源头》一书，深入探讨了1600—1740年之间的英国小说。其重要论点是：17世纪中叶至1740年之间的小说发展仍处于观念的冲撞孕育期，文学中的“真实”和社会阶级的“归类”观念尚未成形。在1740年以前，作为小说文体特征之一的写实策略是暧昧矛盾的，它其实同时兼有传奇的旧貌和写实的新手法，而不能武断地对其作者和作品统统冠以“现代”的封号。不论是从文体特征的角度还是从阶级意识的领域来说，小说在孕育期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是复杂互动的，不可截然分开。麦肯认为，研究文类理论不能脱离文类的历史，要从历史中去了解文类。他指出，瓦特的外缘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偏执于

“形式现实主义”^①，以此为标准，以至于重理查逊而轻菲尔丁；二是一味地认定中产阶级在此时业已形成，而忽略了许多在新旧阶级矛盾冲突之际所可能产生的中间意识，即介于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意识形态状况。其实在瓦特所谓的形式现实主义中存在着许多触目可及的传奇和贵族文化的传统。

阿姆斯琼从性别历史的角度进行小说史研究，她的《欲求与家内小说——小说的政治史》一书直截了当地切入小说历史与性别历史的交汇点，指出小说的兴起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就是女性的兴起，三者合而为一。阿姆斯琼认为瓦特的理论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18世纪的许多小说出于女性作家之手？她以“欲求”的心理因素解释阅读过程，认为早期理查逊创作的“家内小说”塑造了成功地扮演主内角色的有德女性。这一传统由简·奥斯丁、夏绿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继承下来，启发了女性意识，也创造了女性的书写空间，在现代性爱史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性别意识产生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性别意识是文化的建构，有其历史；其次，个体在文学中的呈现促使现代的个人变成经济和心理的实体；第三，现代的个体最初且最重要的，是个女人”^②。18世纪出现的“家内小说”如同一则神话，它撇开了当时女性无法介入的外在的政治世界，而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创造了女性主权，逐渐而不带革命激情地转变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角色。阿姆斯琼甚至认为，早在18世纪小说中作为“家内主”的理想女性已经开始参与性别分工的规划了。

亨特的《有小说之前》对瓦特理论的意义进行了最彻底的阐释。亨特认为，到1740年，小说在当时人的眼里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文类，但是小说是在当时各种力量互动的背景之中出现的，而不是文学叙述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特别不是传奇发展的产物。亨特侧重于18世纪文化外缘的议题（读者、出版机制和意识形态等），将小说视为具有明确历史坐标及文类属

^① 瓦特把一种充分、真实地记录人类经验的叙事方法称为形式现实主义，见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

^②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7.

性的文化产物。《有小说之前》后半部专注讨论 18 世纪小说的“前文”(pre-texts): 新闻文体、天意故事(providence books)、指引传统(guide tradition)、传记(private histories)、历史、自传和游记等,认为这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利于小说的出现。

上述学者的研究在观点方面有一致之处,也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小说的性质是有共识的。他们都认为,小说是一种文化力量,它充满新鲜的活力,体现了历史的进程并推动着时代的潮流。他们修正了新批评式的琐细平凡的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诠释前人所忽略的通俗文体,揭示出 18 世纪英国小说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价值,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这一时代的重视。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一时期小说的研究也有助于小说研究者扩大视野,从历史的、纵向的角度考察小说文体的特征,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小说文体的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影响较大的学者之外,一些有关 18 世纪小说的权威的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也主要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 1998 年出版的 *Longman Critical Readers* 丛书中两卷有关 18 世纪小说的文集,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是论述斯特恩小说形式的,其余 19 篇论文都是有关小说的文化历史的研究。由 Leopold Damrosch, Jr. 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 *Modern Essays o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收录的有关小说的论文也主要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进行小说研究的。John Richetti 主编、1997 年出版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收录了英美著名大学里研究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专家的 12 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是关于小说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其余各篇是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有三篇论文对某一作家的独特艺术形式作了专门研究。从英美晚近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论文看,由文化热带动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研究在英美也很繁荣,特别突出的是对于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小说艺术的研究。这两位作家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地位不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现代研究者们发现了这两个文学的“新大陆”,热切地探讨其作品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探讨他们的创作对于小说艺术形式发展的意义,肯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总的说来,从宏观的角度对整个 18 世纪的小说形式进行研究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还有待于

学者们的努力。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在英国文学的研究方面有较厚实的基础和一支较强的学术队伍。但就我国对于英国小说研究的总体倾向而言，20世纪小说最受研究者的青睐，19世纪小说也受到一定的重视，而对18世纪小说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从本人收集到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内评论界于世纪之交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文章不到一百篇。细分起来，关于菲尔丁和笛福的有二十余篇，关于斯威夫特的有十几篇，关于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则极少。从时间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介绍和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文章只有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介绍菲尔丁及其作品的文章，只有一两篇是关于斯威夫特的。对菲尔丁的重视主要是强调其小说的社会批判的功能。9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介绍和评论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的成果出现。只是到了90年代末尤其是近两年才有更多的人关心18世纪的小说、评论18世纪小说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在小说形式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且介绍、评论以前未加重视的理查逊、斯特恩等人的创作。由此，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的热潮也于世纪之交出现于中国，与西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18世纪英国小说热遥相呼应。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18世纪英国“文学热”对于18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这可以国内学术界在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刘意青和黄梅为代表。这两位学者都对18世纪英国小说有特别的研究，她们的研究成果既基于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有一定的前瞻性。刘意青主编了《英国18世纪文学史》，而且在《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上发表的《理查逊与18世纪小说的兴起》中介绍西方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理查逊研究的现状，并就学界扬菲尔丁而抑理查逊的现象提出异议。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国内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国内对于18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从冷漠到热衷、从只重作品的社会批判功用转向对于18世纪小说的文化批评和艺术研究。黄梅于2003年5月推出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则几乎是国内在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方面仅有的一

部专著。该书把小说在当时的兴起和“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研究小说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贯穿全书的主导线索是18世纪英国小说对于“自我”或个体经验的关怀。全书以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即有关“个人”和“自我”的思考——为主导线索，力求通过对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当年英国人在“遭遇”现代生存时所经历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情感危机。另外，《言语的反抗——〈帕梅拉〉中平等意识的解读》（李小鹿，《国外文学》2003年第2期）、《理查逊和帕梅拉的隐私》（吕大年，《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意识形态的诱惑——评理查逊与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描写》（苏耕欣，《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帕美勒〉中的商品书信及女性物化现象》（董淑芳、张在新，《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等在理查逊研究上较有分量的论文主要阐述的是理查逊小说的文化意蕴；《笛福小说〈罗克珊娜〉对性别代码的解域》（张在新，《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则以后结构主义“解域”理论阐释笛福小说对于男性社会传统的背离。对于18世纪小说艺术的分析较多集中于斯特恩，《“独行怪侠”斯特恩〈项狄传〉诡异创作风格浅析》（颜静兰，《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意义：〈项狄传〉的一个哲学主题》（杜维平、金万锋，《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项狄传〉与叙述的游戏》（黄梅，《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等近期论文着重论述《项狄传》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对于作家的研究则相对集中于理查逊、斯特恩这样一些得到重新评价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刘意青、黄梅，李维屏、伍厚凯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具体作家作品也有较为集中的研究。李维屏的作品主要有：《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浅论理查逊的书信体情感心理小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英国第一部实验小说〈项狄传〉评述》（《外国语》2002年第4期），伍厚凯的主要作品有《简论讽刺体小说〈格列佛游记〉及其文学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欧洲近代小说的先驱：笛福》（《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总之，18世纪英国小说这块园地，在西方尚未给予全面深入的开掘，在中国则刚刚开始。对这个世纪的重要作家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溯本清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研究只有弄清了其形成发展的过程，才能探讨规律，把握本质。从18世纪初笛福创作小说以来直到19世纪初奥斯丁和司各特的创作，英国古典小说形式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发展，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形式规范。因此，基于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从叙述学的角度，通过对英国18世纪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对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全面的考察，探究它的发展形式的发展历程，发掘其初期阶段特有的叙述方式和表现原则及其基本的审美特征，以期进一步探讨小说艺术在19—20世纪的流变、发展，最终把握这一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

当前的小说研究主要是状态研究，对于长期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则不够重视。把过程简化为状态，当然是一种易讨好的做法，并且具有简洁明了的优点。但小说文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进程，不阐明这一进程，则很难理解现今小说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伊恩·瓦特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及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小说产生的原因。本书则从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的研究、分析，描述小说这一文学文体在其最初阶段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追踪其演变、发展、定型的过程，研究某些特定的、发展着的特征的变化并揭示和解释有关的情况。基于英国小说文体到18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形成，小说文体的各种要素和特征基本具备，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品。18世纪后期的小说只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小说文体的概念，基本上没有新的突破，限于篇幅，不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本书以叙述学为基本理论，以话语与故事^①两个层面为基本结构框架，对18世纪英国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其在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上突出的特征以及小说与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60年代是叙事学发展的早期，这一时期的叙事理论在结构主义及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影响

^① Seymour Chatman的 *Story and Discourse*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对叙事文的话语层面进行论述，后两个部分论述叙事文的故事层面。按照查特曼的分类标准，话语属于叙事文本表达的形式，故事属于叙事文本内容的形式。参见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下发展起来，又称为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特点：一是以较为简单的叙事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寻叙事作品的叙述语法，以帮助理解作品的结构意义；二是将叙述本文视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将其研究对象严格地限定在叙述本文之内，而排除其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相关联的要素；三是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其研究对象，避免对作品作出审美的价值判断。总之，结构主义叙事学在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方面的模式和方法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有一定的狭隘性。20世纪70和80年代被称为“经典叙事学”时期。这一时期，叙事学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热奈特、里蒙-凯南、米克·巴尔、查特曼、普林斯与斯坦泽尔等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属于这一范围。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试图去探讨叙事作品的基本叙述语法，而主要把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叙述本文作为其研究对象，探讨在这样一些叙事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叙述性以及叙事话语中的种种形态。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即所谓后经典叙事学）进入当代时期，其研究目标又发生了某些转变，从仅仅强调本文研究转变为不仅仅关注对本文内在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对本文与其外在关联的研究。当代叙事学三个突出的特征是多样化、解构主义和政治化^①。多样化是指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大规模拓展和研究对象的包罗万象；解构主义指当代叙事学在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中热衷于发现不确定性，赞成叙事作品中有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观点，并设法揭示叙事作品中相矛盾的各层面及其复杂性；政治化指把文学当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

本书的结构框架主要参照经典叙述学家查特曼对叙事作品结构的分类标准，选择查特曼所提供的话语与故事两个层面作为基本的结构框架^②，对18世纪英国小说所表现出的较为突出的特征进行研究与总结。而在具体分析研究中，又参照了当代叙事学的理论和思想。例如，对于斯特恩小说

^① [英]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② 第二章“叙述模式”属于查特曼的话语层面，第三章“结构模式”、第四章“人物模式”基本上等同于查特曼的故事层面。

的研究，就运用了当代叙事学思想，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进行分析。因为，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中，像《项狄传》这样的结构上不合常规的作品是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的，而运用当代叙事学理论，则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作家所采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段，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把小说创作视为一种游戏，一种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游戏活动）。此外，本书在对于18世纪英国小说作品的叙事学分析中，不仅注意概括18世纪英国小说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而且注重将叙事学理论的运用和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内涵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相互结合起来。

